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九八期 ——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9c)

【本刊专稿】周恩来与彭德怀在 1967 年受到的迫害	袁笠翁
【文革一页】风雨小靳庄	姜毅然·霞飞
【亲历者言】“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孙宇亭
【文革点滴】略谈军队院校的“文革”	张建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周恩来与彭德怀在 1967 年受到的迫害

• 袁笠翁 •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 1965 年 11 月 10 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著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以来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1〕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2〕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在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给以阐明和论述。

“揪彭”无疑符合毛泽东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1〕在 1966 年 12 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但是戚本禹则声称其是执行周恩来的命令；〔3〕

〔2〕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 12 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

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4）

实际上根据笔者对戴维堤先生（戴先生曾经是文革中著名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的一把手）的访谈和据其在回忆录中所写，去抓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1966年12月，朱成昭领导下的“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前前后后总共派了第三批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但是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5）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首的、100多人的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以上的所述内容为宋永毅对朱成昭的访谈和朱成昭本人的口述所证明。（6）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7）

实际上就在12月23日凌晨4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8）而周恩来在24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9）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10）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道：“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11）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12）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

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13)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14)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傅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15)

实际上，彭德怀专案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杨成武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16)贺龙被打倒后则是由周恩来兼任。(17)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专案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专案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专案组的会议，中央专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18)也就是说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林彪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所以无论是刘少奇，彭德怀案还是贺龙一案，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最后给他们定罪的不论是谁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康生，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周恩来同意之后，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到：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19)而这些却丝毫不见于官方所编纂的《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

关于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吴法宪也给予解释。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吴法宪则回忆到：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1970年9月17日。黄永胜则在11月3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

己。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广而推之，对于成千上万的人在文革中被中央专案组所迫害，周恩来同样是罪不可赎，因为对于作恶多端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央专案组，周恩来则是其首要负责人。在反思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同时，有人却以种种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只能用毫无说服力和具有真实客观性的“违心”来为之开脱，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恩来的本来或者历史原有的形象，难道不应该浮出水面嘛？

注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889页
- (2) 沈国凡《1965年后的彭德怀》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年版
- (3) 1:《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10页；2:《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22—723页；3:根据王力的回忆，戚本禹对于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来和拉彭德怀出去批斗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小组的会上批准决定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30页
- (4) 聂树人《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三九期 二〇〇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 (5) 虽然戴维堤先生的回忆录里面声称是11月份，但是根据事情的发生经过，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为12月份。
- (6) 1:笔者同戴维堤的谈话记录 2006年夏；2: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发行稿；3: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华夏文摘增刊 第363期 2003年12月9日出版；4:《朱成昭自述》原稿刊登于浴火凤凰网站
- (7)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主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11页
- (8) 1:王春才《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270—272页；2:王焰主编 人民出版社《彭德怀年谱》1998年版 第798页
- (9)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年谱》1997年版 第104页
- (10) 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发行稿
- (11) 力平主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 中共中央文献室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80页
- (12) 李明国《彭德怀传》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481—482页
- (13)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版 第94页
- (14) Cheng Qian 《Wenge Mantan》手稿 第64页
- (15)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 主编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22—723页
- (16) 杨成武《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纵横》2000年第1期，第18页
- (17) Cheng Qian 《Wenge Mantan》手稿 第67页
- (18) 1: 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

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82；2：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 可见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3：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 参见于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19）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7年版，第697页—699

~~~~~  
【文革一页】

## 风雨小靳庄

• 姜毅然 • 霞飞 •

生长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小靳庄的。这个小村庄因为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它成了江青的“点”后，在全国广为宣传。后来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大出风头，江青还把外宾带到小靳庄去参观。粉碎“四人帮”后，小靳庄的所谓“经验”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小靳庄重新崛起。那么，这个本不知名的小村庄，经历了怎样的风雨？

### ◇ 靠实干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建国后，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也走过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也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也搞过“四清”。但在这些运动中，小靳庄不前也不后，因此也总是不那么出名。上边来宝坻县视察的领导，或者来宝坻县办事的外地人，大多数不知道有个小靳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到了小靳庄。小靳庄人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也是抱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小靳庄人搞政治斗争的结果，却是土地荒了，粮食产量少了，后来就吃返销粮了。

小靳庄人发现种地的人单纯搞政治运动，是代替不了吃饭的，于是，他们重新操起了锄头。而且，受尽饥饿折磨的小靳庄人重新拿起锄头后，便下了狠心，在种地上花了大力气。1970年，他们已经不吃返销粮了，社员们还能在每年的秋后分到一些现钱。接着，小靳庄人又大干两年，到1972年，粮食亩产量破天荒上了“纲要”。当时，中央对农业生产规定了三个目标：一、“上纲要”（亩产粮食400斤）；二、“过黄河”（亩产粮食600斤）；三、“跨长江”（亩产粮食800斤）。可是，北方农村粮食亩产量大多数上不了“纲要”，于是，“上纲要”就成了北方农村的奋斗目标，上级也派许多干部下乡抓“点”。经过一段时间，北方农村已经有一些生产大队“上纲要”了，因此，小靳庄在1972年“上纲要”，并不是最早的。但是，小靳庄“上纲要”却引起了轰动，原因是小靳庄的土地太差了，原来太穷了。在这块贫瘠的盐碱地上能够“上纲要”，确实不简单。于是在宝坻县“农业学大寨”的光荣榜里，挂上了小靳庄的大名，宝坻县也对小靳庄“上纲要”的事情作了报道。

小靳庄人对外介绍的“经验”也是实在的，就是大干、苦干，改土积肥。他们自己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干下去的。到1974年，小靳庄的粮食产量有了新的飞跃，亩产超过800斤，一举“跨长江”。这一下，小靳庄更有名了。小靳庄的代表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小靳庄曾先后归河北省和天津市管辖）“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奖台。小靳庄人从心底里感到了自豪

和骄傲！

小靳庄虽然出了名，但只是限于宝坻县，顶多也就是在天津市范围内。它仍是坐落在幽燕大地上的一个普通小村庄。

◇ 江青说“这是我的点”

1974年6月，江青来到天津市，住在天津市第一招待所1号楼。这个招待所是20世纪50年代为毛泽东修建的，条件比较好。江青到天津后，一连几天没有出门，就在招待所里召见天津市委领导干部来谈话。毛泽东的一个亲戚叫王曼恬，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也来这里谈过话。谈话之余，江青就到天津俱乐部去游泳。江青除了了解“批儒评法”情况外，还在天津市召开的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谈儒法斗争史，大肆吹捧吕后和武则天，说她们是有作为的杰出的女政治家。江青说：“现在文章很少提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会搞这么大的运动？”江青特别强调：“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指林彪、陈伯达。”江青的话明显指向了周恩来。

江青发表完演讲，要进一步听天津市“批儒评法”运动的汇报。但是，天津市实在没有抓出“批儒评法”的什么新典型来，除了照着报纸上的腔调讲几句口号式的话外，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使江青很不满意。当时的天津市委领导没有办法，只好把搞政治活动多一些的农村，也当作“批儒评法”的“典型”来凑数。有一天，江青见天津市警备区司令员吴岱没有在身边，就问：吴岱到哪里去了？陪同江青的解学恭答：去小靳庄了，那是他抓的一个学大寨先进典型。江青就问：小靳庄什么地方先进？解答道：“批林批孔”先进。还说，小靳庄还办政治夜校，不光学政治，还学唱革命样板戏、赛诗。听了天津市委领导的这些话，江青十分感兴趣，但她同时也有一点怀疑。她认为，世代务农的小靳庄人，怎么会有这样高的文化素养？还会唱样板戏？她立即要求详细汇报。可是，天津市委领导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这样，江青便决定亲自去小靳庄看个究竟。

6月22日，江青一行在天津市委领导陪同下，乘小汽车从天津去小靳庄。

按照预先安排，小靳庄召开了欢迎会。会上，党支部副书记首先讲话：“今天，敬爱的江青同志，在百忙中来到小靳庄，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我们表示极大的……”支部副书记刚说到此，江青就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样子。支部副书记见江青不耐烦，立即收住话头，让群众发言。预先安排好的一个男社员小心谨慎地站起来刚要发言，不料却被江青拦住：“让妇女先发言。”于是，妇女队长于瑞芳站了起来。她还没有开口，江青就问：你叫什么名字？答：叫于瑞芳。江青一听，马上说：这个名字不好听，就改为于芳吧。江青给于瑞芳改完名字，也不让她讲话，直接问：你会唱样板戏吗？于瑞芳说会。接着，就硬着头皮唱了一段《红灯记》中的唱段。接着，王孝齐站起来发言，江青把“齐”听成了“岐”，认为是周文王摒弃过的岐山的“岐”，就大发议论：周文王嘛，是奴隶主的代表人物，你这个名字不好，就改为王灭孔吧，代表先进思想的人物。江青见一个人就先问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是给他改名。她把女青年王淑贤的名字改为王先，把周福兰的名字改为周克周。还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

改名改得差不多了，江青没有了精神。然而一位女社员的发言，却使江青重新来了精神。这位女社员在发言中批“驴驾辕，马拉套，妇女们当家瞎胡闹”时，说：“谁敢说俺瞎胡闹？这是对俺半边天的污蔑。江青同志是女的，却领导文化大革命，领导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杀向帝、修、反。”听到此，江青颇为得意地频频向这位女社员示以笑脸。随后的演出挺热闹，由社员朗诵诗，再和演员搭配着唱几段样板戏。

江青决定在小靳庄吃午饭，以表示自己和农民“三同”。江青对吃饭倒是没有什么讲究，相反，她对在小靳庄吃上农家饭十分满意。饭后，江青在一户社员家睡了午觉。醒来后，她把陪同她来小靳庄的天津市委领导叫到身边，告诉他们：“小靳庄社员能批林批孔，又能作诗，又能唱样板戏，以后这里就是我的点。你们要经常来，你不来，我就敲打你。”江青临上车之前，告诉天津市委领导，要尽快搞个小靳庄经验的总结材料，送到她那里去。

江青离开小靳庄不久，一份关于小靳庄经验的报告就摆在了江青的办公桌上。江青看后，立即提笔在报告上批道：“小靳庄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江青指示后，将材料在政治局传阅。接着，姚文元主管的宣传口就开始大量报道小靳庄的经验。从此，小靳庄经验出笼，风靡全国。

#### ◇ 小靳庄的所谓“十件新事”

江青确定小靳庄是她的“点”后，在她的指示下，中央的宣传部门对小靳庄进行了广泛宣传。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小靳庄的“十件新事”。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时，对着全村的老百姓说：“你们干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来，比如人人会唱歌，人人会写诗，像革命英雄那样去生活，我保证使你们成为了了不起的人物，闻名全国。”

小靳庄“十件新事”的第一件新事就是办起了一所政治夜校。其实，小靳庄早在1971年就办夜校了，但不是政治夜校，而是农业科技夜校。当时，庄稼人觉得这事挺新鲜，对办农业科技夜校兴致很高，晚饭后，丢下碗筷就往夜校跑。夜校有时也到田间地头去讲。夜校在开讲技术课前，有时也念几段报纸。“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党支部书记王作山认为抓政治要紧，就不让夜校讲技术课，只讲政治课，就是读报纸上的“批林批孔”文章。后来干脆就叫政治夜校。在政治夜校里，白天社员劳动时，有谁干得不好了，要批评一下，有哪个社员不劳动而去搞自己的副业去了，也要批一批。

江青把小靳庄的政治夜校当作第一号“经验”，不但宣传，还要巩固。她指示天津市委，要派大学教授到小靳庄政治夜校来讲课。在1975年冬天，天津南开大学一名教授冒着大风雪来给农民讲政治经济学，可识字不多的农民怎么能听得懂呢？一个叫魏文中的政治夜校骨干说：“我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哪能听得懂什么‘垄断’呀！”

《人民日报》1974年8月4日报道说：小靳庄“办起了一所深受群众欢迎的政治夜校”，三年来，政治夜校学员日益增多，全大队250多名整、半劳力全部参加了学习。他们每周学习三次，坚持不懈，一批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分子在这里成长起来，一批老社员在这里摘掉了文盲帽子。《人民日报》1975年6月4日头版头条报道说：“小靳庄政治夜校越办越好”，选学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人民日报》1976年8月29日报道：小靳庄“深入批邓抓要害，坚持斗争永向前”。江青还让小靳庄组织起一支理论队伍，据说有58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为革命学习理论！”但是，这些文化水平本来不高的农民，能搞出多么深的理论来？于是，他们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用他们平时常挂在嘴边的顺口溜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理论见解”。下面是小靳庄一个理论骨干写的一首“批林批孔”的“理论顺口溜”：

两个毒瓜一根藤，两个和尚一本经，两人走的一条路，做的都是复辟梦。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小靳庄大队支部书记结合“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写了政治性特别强的一首顺口溜：

挺身顶过台风吹，哪怕地震房屋坍，深入批邓抓要害，坚持斗争永向前。

小靳庄的第二件新事，是农民写诗。小靳庄在过去就有编顺口溜的风俗。农民们把劳动、生活中的经验和他们处世为人的经验，编成顺口溜，用以教育后人。后来，上边布置农村抓“批林批孔”，小靳庄党支部书记想不出什么组织农民搞政治的好办法来，就把顺口溜这种形式和政治联系起来，自己编，也组织农民编了一些顺口溜。渐渐地，小靳庄就成了诗乡，全村100多人参加了写作，形成了一个场面壮观、有声有势的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不到一年工夫，就写出了1000多首诗。于是，上边有人认为这是好经验，还组织人给编了诗集。江青认为农民写诗是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之一，并调来诗人帮助改诗。修改过的诗，江青就安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小靳庄的第三件新事是农民唱样板戏。小靳庄人天性活泼，过去老一辈人爱唱旧京戏中的段子。“文化大革命”中，搞普及样板戏，一打开广播，就是样板戏。小靳庄人听的时间长了，加上原来就有爱唱京戏的习惯，也就跟着收音机学会了样板戏里的许多唱段。小靳庄的党支部书记就顺势组织社员在村头、在地头，搞一些演唱会，还筹钱买来一台电视机，让全村社员边看电视边学唱样板戏。江青听说这里的农民爱唱样板戏，非常高兴。她认为，样板戏是她抓的，这个小村庄的农民竟然这样爱唱，说明样板戏有“威力”。她于是想把小靳庄农民唱样板戏这件事与政治结合起来。她当时诬陷邓小平反对样板戏，就说：小靳庄农民爱唱样板戏的行动，是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反击。江青还说，不但要会唱样板戏，而且还要学样板戏中的革命英雄人物。于是，在干部们的动员下，许多人把平凡的事情和李玉和、杨子荣、江水英、方海珍等挂上钩，出现了一些牵强附会的说法和做法。在唱革命样板戏时，一些唱得好的、崭露头角的，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登上了舞台。逢年过节或者农闲时，文艺宣传队就演出。演出也不限于样板戏，还唱《红大嫂上夜校》、《四个老汉批林批孔》等。江青说，这是歌颂劳动人民，是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

小靳庄还有一些新事：女青年订婚、结婚不要彩礼；男青年结婚也不讲排场，嫁娶这样的喜事，大队召开一个欢庆会，就完成了全部礼仪送入洞房；开办图书室；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村里死了人，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寄托哀思；提倡火葬；提倡晚婚晚育。

但是，这些新事、新风尚，并不是江青搞的，是小靳庄人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早就有了群众基础，加上大队党支部的引导而形成的。在江青没去小靳庄之前，甚至在“文革”之前，这里已经有了新的风尚，而江青却把这些当作是她自己抓“点”抓出来的。

不仅如此，江青把还本来朴素的东西搞得十分庸俗。例如，在农民写诗问题上，江青非要搞一个经常性的赛诗会。赛诗会前，农民写的诗，还要由上边派来的人“指导修改”，经“指导修改”的诗，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性。在江青的要求下，小靳庄编诗、赛诗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人人都在作诗，人人都要登台赛诗，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要编个顺口溜在会上念一念。

197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型的农民 崭新的诗篇》的文章。据这篇文章说：“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鼓动下，他们（指小靳庄人）开展有声有色的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101户的大队就写出了1000多首战斗的诗歌。在小靳庄，干部、社员、妇女、红小兵、知识青年，人人能挥笔作诗。”

在江青的建议下，还出版了《小靳庄诗选》，发行全国。



◇ 在马科斯夫人面前表演

1974年9月，菲律宾总统特使马科斯夫人来中国访问。本来没有到天津市访问的安排，但江青对她多次吹嘘说天津市有个小靳庄，搞得如何如何好，还说：“小靳庄是我的点，也是中央的点。”江青建议她去看一看，马科斯夫人只好同意了。接着，江青还要求外交部必须安排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外交部只好安排。江青陪同马科斯夫人到小靳庄后，把她倡导的得意之作——小靳庄人写诗、唱样板戏等，全部展现给了马科斯夫人。

先是小靳庄人赛诗会。赛诗会一开始，是社员于怀哲上场。他一上场就说念道：

新天新地新时代，公社社员多豪迈。满手老茧拿起笔，大步登台赛诗来！

接着，是小靳庄妇女集体朗诵诗。一群穿着朴素的女社员走上台，一人手里拿着一张写好诗稿的纸念道：

银光飘飘星星闪，一轮明月空中悬。政治夜校灯光亮，照得社员心里暖。劳动妇女打头炮，批判会上先发言。提起林彪孔老二，满腔怒火胸中燃。

以上是七字一句的，还有一点诗歌的样子，接下来是说妇女解放的：

孔孟之道横行几千年，劳动妇女挣扎在无底深渊。

孔老二胡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唯恐妇女和奴隶闹翻天。

林彪也跟着孔老二，诬蔑咱们只知道柴米和油盐。

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劳动妇女有了发言权。

毛主席信任咱，把劳动妇女比作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

阶级敌人恨入骨，千方百计阻挡妇女往前干。

胡说什么“驴驾辕，马拉套，妇女们当家瞎胡闹”，诬蔑妇女队长头发长，见识短。

我们针锋相对作斗争，一定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扛在肩。

世上绝无天生智，知识才干靠实践。

依靠群众威力大，斗天斗地斗敌顽。

时代不同今胜昔，妇女能顶半边天。

马科斯夫人不懂中国话，听声音念得很齐，翻译对她说了一下诗的内容，她一听说是讲妇女解放的，也很高兴。

接着是老贫农魏文中上台念诗：

榆木扁担五尺三，一对水桶两头拴，饮满了水，挑在肩，大步流星走得欢。浇一担，绿一片，浇上万担绿无边，毛泽东思想威力大，永挑重担不换肩。

马科斯夫人看着一拨一拨的人上台又下台，也不懂得他们说什么，出于礼貌，只能不住地点头。江青看见马科斯夫人的神态，从随从人员手中拿过一本《小靳庄诗歌选》，送给马科斯夫人。

接着，是小靳庄人学唱样板戏。只见一个老太太走上台，唱了一段样板戏，接着是青年人上台唱样板戏。男青年学唱郭建光的唱段，女青年则学唱李铁梅的唱段。年轻人有力气，喊得声音也大，台上搞得很热闹。马科斯夫人听不懂，也不习惯于听这种高声喊叫，脸上现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江青见此，立即叫小靳庄人换节目，她觉得马科斯夫人似乎对诗歌感兴趣，就让再换成念

诗。

马科斯夫人觉得累了，也没有兴趣再听社员念诗了，江青只好收场，陪着她回到了天津。

邓小平说：“小靳庄有什么好？它是国家用钱喂肥的！”

正在江青抓小靳庄这个“点”的时候，邓小平却发表了不同意见。

1975年9月，中国正在筹备第三届全运会。这是自1956年以来的第三次全国体育盛会，又是“文革”已经搞了九年之后对我国体育大军的首次检阅。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他亲自听取汇报，亲自审查开幕式上的节目，特别是对团体操，从头到尾审查。但是，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全运会开幕式上的团体操特别突出政治。一天下午，邓小平在专心致志地听取即将在全运会开幕式上演出的大型团体操《红旗颂》的工作汇报。他频频地点头表示赞同，不时地拿起笔记下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小靳庄群众体育活动的画面出现了，邓小平皱起了眉头。他打断汇报，问道：“这一组画面是什么意思？”一位陪同汇报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回答说：“这是小靳庄的群众体育活动。”邓小平干脆地说：“撤掉。”国家体委的人听到邓小平这句话后，有些不知所措。邓小平知道他们的处境也不好，自己如果不清楚地表态，他们不好办，便开口道：“现在是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小靳庄有什么好？它是国家用钱喂肥的！”大家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愕然，但同时也十分敬佩邓小平的勇气。于是，立即决定撤掉这个节目。

江青听说邓小平撤掉了小靳庄的节目后十分生气，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发了一通脾气。但主持审查节目的领导人是邓小平，江青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只好把气压在心里。

江青指示她派驻小靳庄的联络员，在小靳庄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针对邓小平的这句话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自从邓小平说了那句话后，江青就加大了对小靳庄的扶持。各种物资上的援助，名目繁多的拨款，使小靳庄受益很多。她还指示一些部门，要组织人到小靳庄去学习，同时要帮助小靳庄劳动。自从江青到小靳庄后，国家为小靳庄无偿拨款共计100781元，贷款51800元，拨给砖瓦31万块，木材13599立方（不含另外的120根杂木），化肥155吨，钢材92公斤。此外，为小靳庄修路、建桥梁耗资43200元，修厕所花9000元。天津市科技局、农林局还无偿在小靳庄试验安装了170亩喷灌。除本地、县、乡和厂矿企业单位无法计算的大量人力外，单是外地和军队前往支援小靳庄生产的人数就有2万人次之多。大批解放军战士，大批天津、宝坻等党政机关的干部来到小靳庄，他们从小靳庄人手中接过铁锨、犁耙，到田间耕、种、锄、割……

#### ◇ 小靳庄成了“批邓”先锋

1975年底，毛泽东已经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四人帮”趁机推波助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了。“批邓”一开始，江青就要求中央派记者去小靳庄采访，而且要求迅速拿出报道稿来。人很快派下去了，报道稿也写出来了，江青让姚文元赶快安排发表。1976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上，赫然印着这样一行大号黑体字标题：“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副标题为：“小靳庄大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前进”。在这篇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去年8月，有人根据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指示”，要小靳庄总结政治夜校为扫

盲服务的经验，妄图把政治夜校扭到单纯扫盲的轨道，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当即顶了回去。“我们的政治夜校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你要的经验我们没有，政治夜校的方向不能变！”“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谁的意思也不行。”贫下中农听了，立即高兴地说：“顶得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真是大快人心。”

他们不光在报纸上搞宣传，还在村子里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会议是在村子前面的大土台子上开的。土台子上写着斗大的字：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大会。会议一开始，就有人领着大家合唱：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  
嘴上讲仁义，  
肚里藏诡计。  
鼓吹克己复礼，  
一心想复辟！  
……

1976年7月，唐山、天津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小靳庄未能幸免。一时间，小靳庄的许多房屋倒塌了。处在大批判热潮中的小靳庄人惊呆了。

但他们没有被地震吓倒，而是奋起抗震救灾。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他们的表现可歌可泣。他们在倒塌的房屋里，把家具和生活用品翻出来，在原来的基地上，又盖起了新房屋。他们没有停止生产，而是继续到田间去劳动。他们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没有让一个人挨饿。全村紧急动员，投入抗灾斗争后，仅两天的时间，就给玉米地追肥200多亩，整修了全部排灌机械，修复了米面加工厂，抢出了7000多斤种子粮。抗震救灾中，小靳庄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恢复了活动，他们打起鼓，敲起锣，在大操场上排练文艺节目，这也表现了他们乐观的一面。

大地震后，江青要表现自己，更关心她的“点”怎么样了。这是她第三次来小靳庄。江青这次到天津后，乘车在天津市内转了几圈，没敢在城里住，而是住在专列上。第二天，她就提出去小靳庄。江青下了车，步行到村子里。村民们站成两排，夹道欢迎她。江青开始对小靳庄人讲话。她先问候了几句，就开始批邓了：

“邓纳吉（她把邓小平比作匈牙利共产党的总书记纳吉）要复辟资本主义，他把中国的煤和石油都卖给外国了！”“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党中央撤销了他的职务，每月还给他200元钱的生活费，你们说宽大不宽大？”江青讲话一向没有逻辑性，刚批了邓小平，马上又讲起了妇女问题：“我要为妇女说几句话。”“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得是女同志！”

讲话之后，江青到村子各处转了转，在地震棚里坐了坐，了解受灾情况。她还去看望了几个社员，对他们表示慰问和关心。接着，她脱下外衣，开始和社员一起进行抗震救灾劳动。休息时，江青和社员坐在村子里的砖瓦垛上，和大家东拉西扯，表现出接近群众的样子。她这次带来了向日葵、油沙豆、玉米等种子，让手下人交给大队，说是为了明年种地用。她见妇女队长于芳头上没有发卡，就从自己头上摘下一个发卡别在于芳头上，以表示她对妇女同志的重视。临走前，她得知小靳庄还没有挖洞，便嘱咐说：“深挖洞，把小靳庄地下全挖空！”

#### ◇ 走向新生活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被抓了起来。

当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文件传达下来时，小靳庄人陷入了迷茫、惶恐、不安的状态。他们沉默了。地虽然照样种，但“批邓”是不再搞了，其他政治活动也不再活跃了，样板戏也不怎么唱了。当小靳庄人知道“四人帮”的罪行时，他们愤怒了。社员们纷纷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也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了批判。

在揭批“四人帮”时，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被隔离审查，王作山的宝坻县县委书记一职和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职也一齐被撤销。要开除他党籍时，他憋不住了：“我们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不是你们把江青领来，小靳庄能被毁了吗？”

后来，王作山直接给万里写了一封信，也给帅孟奇写了信，诉说自己的苦衷。万里和帅孟奇对王作山的来信很重视。在万里和帅孟奇过问下，本着“对党有利，对个人有利”的原则，解除了对他的审查，他才又回到小靳庄。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王作山重新得到小靳庄人的信任，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小靳庄人紧紧跟上时代潮流，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时，在许多地方等待观望时，他们却把全村十分之一的土地承包了下去，灾荒之年，这十分之一的地居然养活了全村近600人。小靳庄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也受到了周围村庄农民的称赞。小靳庄人终于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寻找致富的道路。

时间不长，小靳庄变了。一座座新房盖了起来。农民们不光吃得饱了，还吃得好了。他们家里，各种家用电器齐备。年轻一代，开始追求现代的生活。

□ 《党史博览》 2007年第5期

~~~~~

【亲历者言】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 孙宇亭 •

孙宇亭，男，1930年7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初离休。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式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

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仇，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 this 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 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汪东兴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查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不对，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坐。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势。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谢转向某某某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汪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我能不同意吗？”接着汪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军代表答：“是的。”

汪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汪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的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汪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于是，汪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我和严佑民、赵雪流、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的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半夜的遭遇，真是一堂生动的课，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

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的事。我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冷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做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谢富治、汪东兴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此，他身陷绝境。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子女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银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嫌疑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我得悉严佑民从秦城监狱被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

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隋，久理心底的话，一下子冒了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庾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 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

【文革点滴】

略谈军队院校的“文革”

• 张建明 •

一、前奏

大家都知道“文革”最先是从小城市的大专院校开始的。

1966年5月，北京大学的干部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并进而发动年青学生“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此揭开了“文革”的历史序幕。

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比地方院校晚得多。北京的学生已经把大字报贴上街头时，我们还在准备期末考试。记得一天，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对我说，他接到了家里来信，说北京乱起来了，陈毅被批斗了，说他反对毛主席。没过几天，系里通知要大家上交刘少奇写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当时问指导员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他当时的确不知道。

后来有几个地方大学的“红卫兵”来学校串联，我们看见他们胳膊上套着红袖章，都感到很新鲜。不过，当时军队院校是严禁搞“四大”的，不准贴大字报。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上级终于同意用“小字报”的形式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记得学院里各系都设立了“小字报室”，只允许把小字报挂在房间里。其内容也主要是针对教员的，基本上没有针对干部的。我也写过批判教员的文章，批评教员让我们听“灵格风”英语教学资料是在扩散“资产阶级生

活方式”的影响。现在想起来，是很可笑的。实际上，像这种“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不过，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从1966年7月以后，开始有人贴出了针对学院领导干部的大字报，甚至称院党委是“修正主义”的。由于军队院校的学员不仅来自应届高中，而且有不少来自机关和部队，所以年龄比较大，政治上也比较成熟。因此在“文革”初期，面对院领导是否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数人不认同的。但比较年青的学员很容易接收社会上的影响，“越左越革命”的思潮逐渐在年青学员中蔓延开来，我和周围的同学一样，都很快被卷入了这个“越来越左”的漩涡之中了。以年青学员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干部、教员为代表的“保守派”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于上级有命令，军队的“文革”只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所以“造反”派的势力并没有占上风；相反，率先给院领导贴大字报的学员都做了检查。

我记得，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八月，我还在录音机旁学外语。由于第一次听到林彪在天安门上拖着长腔讲话，觉得很好玩，就在录音机里学林彪讲话，然后再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后来有人说，这小子敢学林副主席讲话，太不严肃了！

1966年9月，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终于拉开了军队院校“文革”的序幕。全军院校的学员都打起背包，集体到北京参观地方大学，“学习文化大革命”。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老军人，他带过兵、打过仗。但他没有想到，这次带兵出征却是他一生军旅中的最后一次，也许是最失败的一次，从此他永远失去了他的指挥权。

## 二、“会师”北京

我们的学校在南京，这里是军队院校最集中的地方。当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发现还有其他院校的学员一起同行。能够到北京去，这对于不少同学来说，还是第一次。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上一次回家探亲是在1966年的春节。那时的北京是恬静的，秩序井然。记得春节期间去看望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家家的饭桌上已经摆上了鱼和肉，三年自然灾害时的浮肿病已经见不到了，商店里的货物已经十分丰富。尤其北京的社会秩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等公共汽车时大家自觉排队，十字路口处绝对没有人“闯红灯”。记得一次我在长安街上走，两位执勤的军人拦住了我，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原来我衣领的风纪扣在无意中脱开了，我因此被记过一次，回到学校还受到了批评。

可这次回到北京，似乎一切都变了。自行车在马路上乱穿，红绿灯已经失去了作用；公共汽车还没有进站，人们就蜂拥而上，小一点的孩子干脆就从车窗钻了进去。只见一队“红卫兵”在长安街上走，一遍走、一边在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最后还有一句口号：“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原来，这就是“文革”啊！

我们被安排在北太平庄附近的测绘学院住下。大家都是席地而睡，和来京串联的学生相比，我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所谓“学习文化大革命”，就是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看大字报。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所以当我们列队走进校门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为了表示支持“文革”，我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革命重担肩上挑。……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要为人民立功劳。”

我们还参观了“破四旧”展览，主要是展出“红卫兵”抄家时发现的所谓“变天账”。有国民党旧人员以前的照片，证件；有一些解放前的旧军服，徽章；还有所谓记录被没收财产的清单等。然而，后来我看过一个展览使我震惊。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居然有一个小“牢房”，是关押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关押期间，居然被关押他的同学用刀刺伤。一看名字，我都认识！他们一个姓鲍、一个姓耿，也是我以前所住机关大院的孩子，没想到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居然在“文革”中成了“阶级敌人”！“文革”初期出现过所谓的“血统论”，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甚至会被“专政”。

我们在北京一直停留到1966年的国庆节。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站方队，等游行队伍通过后再维持秩序。在游行过程中还算顺利，但到了最后就乱了，广场上的学生提前涌向天安门，争着想看见毛主席。等毛主席离开后，大家逐渐散去，后来发现毛主席没有离开，他走下了城楼，从金水桥上走到了广场前沿，这时人们再次涌向天安门，秩序大乱。等到散会以后，天安门前留下了不少鞋子。

1966年10月5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所有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都集中到了工人体育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四位老师接见了我们。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叶剑英宣布了中央的一个决定：林彪将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向社会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第二、叶剑英宣布：军队院校开始采取“四大”的形式开展“文革”。换句话说，军队院校将与地方大学一样，可以组成“群众组织”，院校党委不再直接领导运动。

但是几位老师又做了一些说明，大意是说你们是军人，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再成立“红卫兵”组织，你们已经是保卫祖国的卫兵。

从后来的资料看到，老师们对“文革”是抵触的。所以，当时他们自己对于军队院校开展“四大”也是不情愿的，所以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仍然是强调要稳住局势。但我们这些年青人已经按捺不住获得“四大”权利的喜悦，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满意老师们的讲话，一个来自兽医大学的学员叫李吉才，当场给叶帅写条子，对老师们提出意见。叶帅当场念了他的条子，并做了解释。要不是老师们的威望高，恐怕这个大会等不到结束就会闹起来。

等我们回到驻地，“军营”已经大乱。一些北京有家的先回了家，打算去串联的已经在“自由组合”、拟定行军路线了。我和一些同学则先回到学校，因为那里的人还在等待北京的消息。

然而，他们等到的只能是更加混乱的思想、群众组织的出现、抄“牛鬼蛇神”的家。但更多的同学并没有回校，而是开始了“大串联”。

### 三、参加“大串联”

现在的孩子已经无法想象那时的“大串联”，也许说它是一次免费的旅游容易让人理解。但那绝不是旅游，因为所有的景点、古迹、寺庙、公园都被当作“四旧”破坏或查封。我和两个同学一起串联，选择的路线是南京—西安—重庆—武汉—长沙—北京。一路之上，除了走访了几所军队院校外，就是参观重庆“中美合作所”和湖南韶山。我们还参加了几次批斗会，看了

不少“大字报”。只有坐船从重庆到武汉的一段，算是有些旅游的意思。虽然我们是和“红卫兵”一起乘坐一条装货的驳船，但依然能欣赏到三峡的风光。

最艰难的旅程莫过于从长沙北上到北京的一段了。由于南方的学生们很多没有到过北京，所以都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火车从广州出来时已经没有座位了，到了长沙和武汉就很难能挤上火车了。我们三名军人更不好意思去和学生们挤，怎么办？我们从车尾走到车头，根本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

突然，我们发现火车头与第一节车厢之间的接口处有一个空间。因为接口只是一节过道，通往车厢的门锁着，所以没有人。而接口与火车头之间并没有门，原本不允许有人，不小心随时会掉下车去；而且无法避风雨，好在有军大衣和雨衣，只能在这儿将就了。我们踩着车厢挂钩上了车，刚刚放下行李，看见一群学生也爬了上来。我们赶忙阻拦他们说：这里危险，你们还是到车厢里去安全。可是他们不听，硬是爬进来五、六个，还挑皮地说：“和解放军叔叔在一起，最安全！”搞得我们苦笑不得。

等他们坐定后，我仔细一看，这几个还都是些小孩子。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初中学生，才十三、四岁。再一看他们的打扮，都只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凉鞋，也没带被子。天哪，那时已经是十一月了，北京都快要下雪了，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啊？一问才知道，他们这些南方孩子根本没见过下雪，更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但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会有什么困难，只要能见到毛主席就行，相信到了北京一切都会有的。

火车终于开动了，而且越开越快。风卷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煤渣，打在我们脸上。到了晚上，风更加冷起来，我看见孩子们开始紧缩着身子，把随身带的衣服都穿上也不行。照这样下去，都要冻坏了。我脱下了军大衣，盖在孩子们身上。然后穿上雨衣，站在门口，这样可以为孩子们挡住些冷风和蒸汽，自己也暖和些。半夜里孩子们要撒尿，这倒是方便，对着火车头屁股撒就行了。后来听说，挤在车厢里的学生无法上厕所，尤其是女孩子，有人因此得了病。好不容易天亮了，孩子们又饿又渴，他们倒不客气，打开我们的军用水壶就喝。我看着他们暗自好笑：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还没到北京，我倒先负责“接待”他们了！

火车走走停停，用了三天三夜才到北京。我和战友轮流为孩子们“站岗”，总算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当一个解放军叔叔还真不容易。

#### 四、火药味更浓

到达北京后，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已经是铺天盖地、挂满了街头巷尾。再到几个军队大院看看，也是一样。一天，我在一个军队大院看到食堂里正在批斗一个女军人，领章已经被摘去，头发也被剪掉一大撮儿。听了半天，似乎是说她作风不好，我心里很纳闷，这也是‘文革’要解决的问题吗？

学校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办事处，目的是及时了解重要的消息。结果决定几个北京有家的长驻北京，我也算一个。当时在北京天天可以听到许多惊人消息，记得由我负责传回学校的一条消息是江青的讲话，她“宣布”肖华是“坏人”，是“叛徒”，是军内的“走资派”。我把消息传回去后，学校里当天就广播了。

1967年初，南京军区机关受到了冲击，我们学校的一些学员也参加了。当时我在北京，听说是由于一些院校之间发生了冲突，要求军区出面解决，但军区的态度不能令大家满意。其实在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谁讲话都已经不管用了。冲击军区的事发生以后，许世友

发了脾气，要严肃处理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里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冲击军区没有错，军区不支持‘文革’；另一派认为不应该冲击军区，应当把‘文革’的重点放在解决院校本身的问题上。

当我从北京回到学院时，年青学员中的两派已经形成。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所看到的种种现象使我产生了反感，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的思想还比较“传统”，所以我很快就表态“不支持冲击军区”，并从“造反派”的行列转向了“保守派”。

后来人们把这两派称为“反军派”和“保军派”；在南京地方上也出现过类似的“好派”和“屁派”。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这两派都是在执行极“左”路线，因而都是错误的。只不过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现的程度有区别，一派偏激些，另一派温和些。

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原本是要制止军队院校的过激行为，但结果反而更糟。工作组不仅没有能控制局面，反倒被两派的激烈斗争拖住了两条腿，无法自拔。最后工作组不得不撤走，随后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

1967年7月，武汉的造反派再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一次的势头更猛。“中央文革”派出了谢富治和王力，亲临武汉督战。以“文攻武卫”为口号的“反军”风暴再次掀起，真正意义上的内战一触即发。

我院的“文革”形势也急转直下，“反军派”完全控制了局面，并且动用了军械库的武器。我们这派的主要负责人基本躲出去了，我和另外一个负责人虽然没有离开学校，但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一天三餐由别人送来，白天无法出来活动。我父亲过去从事过我党的地下工作，没想到在解放后我也有体验一下的机会。所不同的是，他干地下工作十几年，从来没有被捕过；而我却因为大意而“被捕”过一次，并且挨了一顿打。

## 五、“还我长城”

“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军队，实际上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指使，这是后来从中央文件中得知的。

1967年5月发生了所谓的“5·13”事件。从表面上看，这是军内两派在一场具体的“文艺演出”活动中所发生的冲突，但实际上是有人想进一步激化军内的矛盾，而林彪则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从此，“军队不介入文革”的禁区被冲破，在全国把“文革”的矛头指向了军队。

也许是老师们结成了抵制林彪的“统一战线”，也许是“文攻武卫”的枪声惊醒了毛主席的睡梦，中央终于打算“制止内战”了，毛主席用了一句中国从来没有的成语为“反军风暴”打圆场：“还我长城”，多么富有诗意啊。

结果，王、关、戚这三个“反军”打手终于被关起来了。

我也终于可以从“地下”转入合法斗争的舞台了。

## 六、尾声

从1967年末一直到1969年，“文革”转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

先是号召群众组织“大联合”，然后又是“解放干部”，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为了解决群众组织对立的问题，上级还派来“军宣队”、“工宣队”，“造反派”的势力被压下去了。

虽然“杨、余、傅”问题的突发造成了“造反派”士气的反弹，但已不能再成什么气候了，因为军队不能乱的看法已成为了上下的共识，就像“破四旧”搞得再凶，也不能把长城拆除一样。

我院“造反派”的结局似乎是略显“悲壮”的。他们最后在学院里只剩下一块阵地——一栋小楼。在强大的攻势下，他们“全军覆没”，个别人还受到“体罚”。不过，他们得势时也“体罚”过别人，算是扯平了。

军队院校的“文革”虽然比地方院校开始的晚，但却结束得早些。当时全军院校大约有111所，也可以读成“妖、妖、妖”所。后来听说又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妖、妖、妖，有股妖风”，于是就把军队院校全部解散或改编了，无论是学员或教员，都下放或转业了。

无论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其结局都是一样，这也许是公平的。部队有老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结局也合乎情理。

## 七、反思

“文革”到底是什么？现在的人们看法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是一场“误会”，是一个偶然的故事，就像是毛主席的车不小心撞坏了刘少奇的车一样，是一次发生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

有人认为是毛主席在泄“私愤”，他认为有人要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中找出岔子来挑他的毛病，就像彭德怀一样。

有人认为毛预感到刘少奇要夺他的权，所以必须除掉他。

有人认为，“文革”是我党历史上“左”倾路线和思潮的反映，因此是又一次路线上的错误。

还有人认为，毛从苏联的变化预感到中国也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因此需要“反修防修”。而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恰恰应验了毛主席的担心，所以发动“文革”是有道理的，不是无的放矢。

我比较愿意从后两种意见的视角来分析“文革”。

首先，“文革”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左”倾路线的反映和再现。只不过以前的路线错误是发生在我党尚未执政的时期，而这一次则发生在我党执政以后，因此其影响力更大、破坏性也更强。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党历史上会屡次产生“左”倾路线的错误哪？它的根源是什么？

第二点，发动“文革”，是否是因为毛主席预感到中国将“复辟资本主义”呢？我的回答是

肯定的。从当时和今天的许多历史资料都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把苏联的变化与中国做比较，并真实地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我不只一次的设想过，如果毛主席今天突然醒来，走出纪念堂，他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他又会如何评说今天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化？

今天，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环境与社会成本过高、腐败问题严重等问题，也是事实。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尚且还在“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毛泽东难道不会再说一次：“还我长城”、“还我河山”吗？假如将来中国出现了苏联今天的情况，是否人们会说，毛主席早有预见，发动“文革”没有错？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改革开放、再回到过去那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更不能再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是否应当从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来纵观历史，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呢？

应当看到，现在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和农民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已经很突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腐败现象的泛滥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引发社会的动乱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当警惕。

“文革”，我希望它能成为一本书，给后人一些启迪和警示。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